

文化传承中的群体动力： 一项基于趣缘社群的实证研究

常立璞

摘要:趣缘社群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通过对利川灯歌演唱团的田野调查,可探讨趣缘社群的文化传承及其群体动力机制。社群的维系与发展来自文化认同、个体需求和主流话语的共同推动。灯歌团结构松散,但成员关系较为亲密,中国式人情因素和领导者个人魅力构成社群的两个重要内聚力。在社群共同目标的驱动下,成员们搜集、学习、表演利川本地民歌,在集体创编中对其进行传唱与创新,促进利川本地民歌的活态化传承。趣缘社群的群体动力主要存在于三个相互影响的层次:个体认知层面的意义建构、成员互动形成的社群结构、体现平台价值的社群实践及其目标。社群成员的文化认同贯穿于群体动力场,将个体意义、社群发展和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趣缘社群;文化传承;群体动力;意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3-0068-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WZD20)

一、研究问题及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在人口流动、工业化、媒介技术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传统文化难以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存在难以延续的风险。在当代语境中,以兴趣结缘的社群逐渐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理解“趣缘社群”(也称旨趣社群)的实践及其群体动力机制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通常表现为一种群体实践。钟敬文认为:“大部分传统文化是群体性的文化活动,它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集体的行为习惯和心理,经由一代又一代集体心理、语言和行为传承下来。”^{[1][11-12]}口头传说、传统民俗节日、人生礼仪、庙会文化、民间工艺等大部分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都以群体为单位。^[2]在具有离散性特征的现代社会,人们通过传统文化这一纽带重新聚集在一起,形成以趣结缘的趣缘社群,即出于共同的旨趣、自愿加入的社团^{[3][471]}。

目前,趣缘社群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关注趣缘社群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比如有研究将地方参与者和外地消费者视为利益社群,其社群实践使传统文化获得商业开发^{[4][118-216]};也有研究把传统文化作为社群共创的文化资源,趣缘社群使传统文化融入当下生活^[5]。第二类通过田野调查探讨传承群体具体的文化实践,比如有研究对湘西非遗土家年、吊脚楼、钢火烧龙等传承群体的内部结构与分工进行分析^[6];还有研究通过对非遗传承制度和群体参与的特点进行讨论^[7]。第三类对现代都市空间中的文化传承现象进行研究,如壮族山歌走进城市成为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8];在城市里通过手机媒介进行网络对歌,趣缘社群唤醒集体记忆和归属感^[9]。人们围绕传统文化进行实践,产生文化认同和社会效益。总体来看,趣缘社群是推动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和

实践平台,但是这三类研究鲜有关注“群体力量”在文化传承中的实践逻辑和动力机制。

趣缘社群具有群体动力特征。1939年,Lewin在《社会空间实验》一文中首次提出“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10],借助物理学中“力”的概念探讨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群体成员间的依存关系等群体心理现象^[11]¹⁰⁴。群体动力学的理论基础是“场论”(Field Theory),认为任何一种行为都产生于各种相互依存的事实整体,具有一种动力场的特征。^[12]²⁵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结构与运行、群体生态、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其主要观点是:群体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共同构成群体生活的力量(forces)^[13];群体的动力特性更多地取决于群体的结构特性^[14];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产生群体内部的张力结构,领导角色的特点影响团体的运行方式^[15]⁷⁹。梅松纳夫认为外在的社会环境(如政策、经济因素等)对群体形成结构性压力,而吸引成员留在社群的力量主要来自社群内部,包括社群共同目标、集体活动、情感因素、领导个人魅力和人际关系等。^[16]²²⁻²⁵群体动力学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类团队管理和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中,比如教育改革、企业效能提升和知识学习等。

在文化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都具有群体动力学的理论背景,他们关注社群中的个体成长、文化实践与社会互动。Fine认为小群体是连接个体和社会的“中间层”,社群结构、互动方式、社群内部文化三者相互促进。^[17]¹²温格等认为趣缘社群能够深化某一领域的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是一个将个体知识融汇成集体智慧的地方。^[18]¹³Argote等认为交互记忆系统、社会认同、情感、社交网络是社群学习效能的主要影响因素。^[19]总的来看,社群是一个身份建构、意义共享和学习知识或技能的平台。本研究尝试采用群体动力学的理论视角,以利川灯歌演唱团为典型个案,通过对该趣缘社群的田野调查来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趣缘社群如何进行社群实践和文化遗产,二是趣缘社群在文化传承中具有怎样的群体动力机制。

二、研究个案和方法

利川灯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编号:Ⅱ-142)^[20],产生于清初,具有三百多年历史,是当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演形式^[21]¹⁹。利川灯歌中的民歌部分被称为“灯调”,在利川本地居民的日常表达习惯中,灯歌与灯调两者经常互通^①。在本研究中,利川灯歌指“灯调”,即民歌部分。利川灯歌演唱团(简称“灯歌团”)成立于2008年,汇聚一群热爱利川灯歌的成员。截至2025年10月,灯歌团成员的数量保持在40人左右,积极参与活动者20人左右。利川灯歌演唱团在利川本地公共文化生活中表现活跃,传承和创新本地民歌的内容与形式,使传统民歌更好地融入利川人的当下生活。2014年,利川灯歌演唱团在利川市文旅局完成民间社团注册,2023年被利川市文旅局授予“利川山民歌传承基地”称号。

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具体研究方法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深描。2023年6月至2024年10月,本研究对利川灯歌演唱团进行实地调查,观察灯歌团的线上线下日常互动、20余次例行学习活动、6场大型演出和10余场各类小型演出,对利川灯歌演唱团主要成员、政府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和本地市民进行深度访谈,主要受访人信息见表1,每次访谈时间在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还根据研究需要对受访人进行多次访谈。深描方法关注个体和社群利用文化符号去形塑、沟通、分享、灌输、转变和复制意义的方式与过程。^[22]²¹⁰⁻²¹¹简言之,深描就是对社会行为背后的“主观意义”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本研究将灯歌团成员的口述内容和社群实践作为意义建构的“文本”,对其背后的“主观意义”进行分析,以期理解社群成员针对自身行为和社群实践的意义建构。

^①杨匡民教授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1982)中,将利川灯歌中的民歌部分称为灯调,意思为配合固定的灯歌表演唱出来的歌曲,因此称为灯调。现在许多人习惯将灯调称为灯歌,因此本文中若不做特殊说明,利川灯歌也指灯调,两者互通。

表1 主要受访人信息

序号	姓名(化名)	性别	出生年份	学历	职业	现居地	家乡
1	牟老辈子	男	1955	初中	农民	利川市区	凉雾乡
2	李老师	男	1951	大专	中学退休教师	利川市区	建南镇
3	阿保	男	1965	高中	农民	利川市城郊	利川市城郊
4	牟老师	男	1962	本科	党校退休教师	利川市区	汪营镇
5	钟山	男	1969	初中	农民	利川市城郊	利川市城郊
6	林风	男	1971	高中	利川市文旅局工作人员,演员、歌手	利川市区	谋道镇
7	王忠	男	1973	高中	小型超市业主	利川市区	谋道镇
8	周洋	男	1980	本科	药店、民宿经营者	利川市区	汪营镇
9	阿攀	男	1992	高中	建筑工人	利川市区	利川市城郊
10	文医生	女	1974	中专	医生	利川市区	南坪乡
11	娟子	女	1972	高中	自由职业	利川市区	柏杨坝
12	翠姐	女	1967	初中	农民	利川市区	柏杨坝
13	杨萍	女	1968	高中	粮管所改制退休工人	利川市区	沙溪乡
14	向姐	女	1970	大专	退休医生	利川市区	柏杨坝镇
15	周老师	女	1963	中专	中学退休教师	利川市区	汪营镇
16	田姐	女	1963	大专	退休医生	利川市区	谋道镇
17	林姐	女	1972	高中	民宿经营者	利川市区	利川市城郊
18	田生	男	1968	大专	利川市非遗传承馆工作人员	利川市区	团堡镇
19	胡馆长	男	1977	高中	利川市非遗传承馆馆长	利川市区	忠路镇

三、灯歌团的传承实践及其群体动力

灯歌团的群体动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个体心理、社会文化、政策环境、人际关系、领导者风格、社群实践及其目标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和制约社群实践。

(一) 社群的维系与发展:文化认同、个体需求和国家主流话语三者共同推动

利川灯歌演唱团的维系与发展来自个体心理的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具体包括对本地文化的认同、发展个体兴趣的需求和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

灯歌团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文化认同。利川人热爱唱歌是一种地方传统。农耕时期,人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唱民歌,进行日常娱乐、交流,提高劳动效率。利川被称为“民歌的海洋”,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龙船调》即改编自利川灯歌中的民歌《种瓜调》^[23]。利川有许多俗语描述当地人爱唱歌的状态,比如“这边唱,那边和,一唱唱到月亮落,越唱心里越快活”。时至今日,在当代城市生活中,不少利川人仍然把唱歌作为兴趣爱好。

2008年,利川本地一群热爱唱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将学习唱歌作为日常娱乐,曲目包括流行民歌、京剧等。一位成员偶然间唱的一首本地民歌,激发起其他成员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他们在这首歌中听到利川的历史和故事,且曲调和歌词是方言性的,生动有趣,独一无二。成员们认为这类歌曲非常宝贵。在文化认同驱动下,有志于传承利川本地民歌的几个人成立一个新的社群——“娃娃要过河”。该名称取自利川灯歌《种瓜调》的一句歌词,体现传承本地民歌的社群定位。2011年,

在利川文化名人谭宗派、甘远成的建议下,该社群更名为“利川灯歌演唱团”。这一名称借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利川灯歌”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赋予社群实践更多社会价值和政策合法性。团长牟老师说:“改名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清晰的定位给团队明确的发展方向,社群活动更加侧重利川灯歌等原生态民歌的学习和表演,更符合社会主流的文化政策导向。新的名字使团队得到快速发展。”(2023年10月24日)。更名后,灯歌团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成员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社群获得更多参与当地公共文化活动的机会。

在趣缘社群中,成员通过社群来满足发展个人兴趣的心理需求。社群能够发展是因为能给成员和团队提供价值,而价值是社群生命力的体现。^{[18]3} 灯歌团成员需要一个平台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满足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他们自觉参与社群活动,自发组织,自筹经费,每周进行一至两次集体活动,主要内容为学唱本地民歌、参加公开的舞台表演。个体的自我实现有助于心理健康^{[24]56},是灯歌团成员持续参与社群活动的动力之一。成员周洋说:“在灯歌团,唱歌能够使我的心情愉快,感觉心理更健康了。夸张一点地说,很久不唱歌就会感冒。”(2023年6月24日)。同时,社群为成员提供展示学习成果的舞台,使成员实现表演者的升华。团长牟老师说:“成员学会这些歌曲后,需要一个舞台展示的机会。如果缺乏舞台展示的机会,就会降低成员的参与度和活跃度。”(2023年6月23日)。成员积极学习利川灯歌,参与利川本地公共文化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成员发展个人兴趣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感受到传承灯歌的意义。

利川本地的政策环境为灯歌团的发展提供了土壤。2004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2018年,利川市启动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工作。与非遗保护相关的国际公约、地方法规和举措以“政府话语”的形式出现,形成一种交织着符号话语、经济杠杆和意识形态的公共文化政策生态。在该政策生态下,本地人曾经的日常文化实践被转换为主流话语中的文化保护,并获得制度性扶持。通过充分利用政策话语和政府背书,灯歌团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社会资源。

文化认同的影响鲜明地贯穿在社群发展历程中,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纽带作用;个体需求的影响在社群发展初期更为明显,参与社群活动能够满足成员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国家话语的影响在社群发展成熟期更为明显,为社群发展提供生态环境和社会资源。三者存在于不同层次,共同推动灯歌团的成长。

(二) 社群的张力结构: 松散而亲密的开放式社群

群体之力的特征更多地取决于其结构的特征,群体结构存在于成员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中。灯歌团的社群结构松散而亲密,呈现出独特的结构张力。

共同的兴趣将不同背景的成员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开放式的趣缘社群。最初,成员们加入灯歌团的主要原因是:对本地民歌兴趣浓厚,希望加入一个组织进行娱乐消遣、提升唱歌技巧。同时,成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歌唱能力,这样才能保证跟得上学习民歌的进度和舞台表演效果。个体需要满足“兴趣”和“能力”两个标准,即可获得成员身份。成员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他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来选择是否参与某次活动。依据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成员的类型结构呈现为一个“年轮状”格局,见图1。

社群成员以团长为圆心,骨干成员、积极成员、外围成员依次向外延伸;团长具有核心作用,不同圈层的成员参与度不同,骨干成员、积极成员、外围成员参与度依次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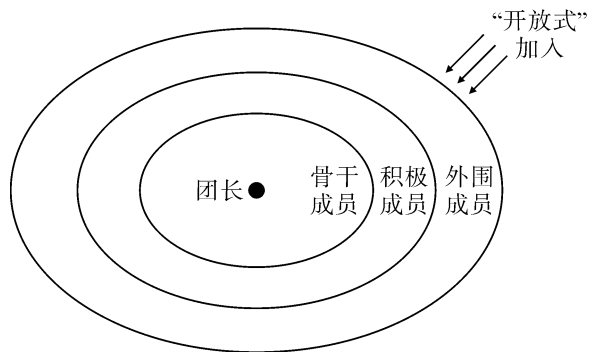


图1 利川灯歌演唱团成员的类型结构

团长牟老师是灯歌团的领导者,也是核心人物,他主要负责活动组织、演出对接、内外沟通等工作,主导灯歌团的发展方向。骨干成员是指那些歌唱能力较强、参与度较高的成员,比如在南坪乡卫生院工作的文医生、民宿经营者周洋,二人经常协助团长组织活动。积极成员是指参与活动频率较为稳定的成员。他们具有良好的歌唱能力和参与热情,但参与目的不一。这类成员数量最多,构成灯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围成员由对灯歌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专业歌手、词曲作者组成,他们会阶段性地参与灯歌团的活动,比如专业音乐人士姚本树为成员传授民歌知识、教唱改编曲目。外围成员给灯歌团带来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为传统文化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

团长牟老师表示:“谁喜欢唱歌或者对我们本地的民歌感兴趣都可以来,我们都欢迎!但是,我们也不勉强,如果家里有事不能来,都可以理解和体谅。”(2023年7月26日)这种开放式的社群结构能够更好地吸引新成员加入,为灯歌团营造出宽松的团队氛围。但是,灯歌团没有强制性的规则,结构松散,使社群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

灯歌团看似松散的社群结构被“人情”紧紧地牵引着。灯歌团内部拥有来自地缘关系的信任基础,存在相对紧密的人际交往。利川是一个县级市,许多成员在加入灯歌团之前就相互熟悉。比如,成员周老师的丈夫与团长曾经是同事,她与成员田姐是高中同学;成员田姐和向姐都是当地医院的医生,相互之间熟识;成员阿攀和成员阿保是多年好友。这种熟人网络增加了成员间的信任感。

中国传统人情社会的行为逻辑进一步影响着成员们的互动方式,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使灯歌团形成较为牢固的人际网络。成员家中有红白喜事,一些关系好的成员会“随份子”,轮到自己家有事时,别人也会进行“偿还”,成员之间在“施报平衡”中建立起“人情法则”。2023年国庆节期间,成员王忠的女儿结婚,当天有十几名成员自行前往参加婚礼。大家会根据人情关系远近来随礼。人情往来加强了成员之间的信任和情义,让歌缘式的弱关系走向一定程度的强关系,社群归属感和内聚力也得到提升。

在社群活动中,成员们逐渐培养起友谊和情义。“给朋友帮个忙”经常成为成员参与活动的原因。2023年7月,十几名成员来到腾韵民宿为游客免费演出,该民宿老板林姐是成员林风的高中同学。翠姐说:“我来这里唱歌,是因为林风这人不错,给他帮个忙。”(2023年7月22日)成员周洋在自己经营的避暑民宿举办候鸟联谊会,成员们每年都会义务参与演出。灯歌团内部的人际关系形成一个无形之网,很多时候,参与社群活动成为一种“人情来往”。

个人影响力也构成“人情法则”的内容。在灯歌团成员眼中,团长牟老师与人为善、无私奉献、综合能力强,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成员杨萍说:“牟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以前因个人原因退出了,后来我不忍心拒绝,又继续加入了。”(2024年5月29日)成员钟山说:“只要是牟老师召唤,我基本上都会到。”(2024年5月29日)在成员们看来,团长对灯歌团和成员的“付出”成为一种“人情”。成员们通过积极参与社群活动来“还人情”。

以兴趣为纽带的灯歌团在结构上较为松散,但成员之间保持着较为“亲密”的联系。这种宽松而亲密的张力结构有利于社群发展。一方面,社群结构扁平,开放包容,能够吸引多元人才加入,为社群发展提供活力和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成员卷入人情之网,参与社群活动的动因掺杂着“人情偿还”,为社群发展提供较为稳定的内聚力,保证社群结构的动态平衡。

(三) 灯歌的传承与创新: 学习型社群的共同目标

团队的目标是指“团队愿意通过一起努力而实现的一种理想状态”。^{[25]15} 共同目标的确立表明社群发展的方向和社群存在的意义,能够使成员在态度和行为上趋于一致,从而为社群发展提供动力。此外,共同目标的实现还体现出社群作为平台的价值。

灯歌团是一个学习型社群,提升表演技能是社群的共同目标之一,也是社群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牟老师说:“成员们要不断地学习新歌,然后进行公开表演。如果缺少完成共同目标的机会,那么大家就会觉得活动没有意思,积极性就不高。”(2023年6月26日)在社群发展的不同阶段,灯歌团主要的共同目标有:获取学习资料、学习唱歌、舞台表演,它们是社群实践的重要动力来源。

在社群发展初期,学习资料的获取是灯歌团首要的共同目标,也是一种重要的民间文化传承行为。灯歌团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获取民歌资源:社群成员到农村采风、社群内部农民歌手口头传授、将文字记录转换为口头歌唱。社群成员积极参与歌曲采风,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寻找善于唱歌的老人,去学习和记录。一位吕姓成员回凉雾老家学了《草鞋打起我就来》;前成员阿涛略懂音律,他搜集不同版本的《闹五更》,并筛选出最好听的版本在灯歌团传唱。团长牟老师则前往当地有名的农民歌手家中采风,比如凉雾的牟一胜、柏杨坝的利川灯歌非遗传承人刘林安和聂成。牟老师具备一定的音乐素养,能够在现场口头学习中筛选出较为优秀的歌曲,比如《十月小阳春》《双手搭在妹儿肩》《干妈问病》等。灯歌团的学习资源还来自文字记录。本地音乐人士甘远成帮忙在由湖北省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利川市民间歌曲集》中筛选出优秀的歌曲,灯歌团根据曲谱传唱。搜集学习资源的方式展现出学习型社群“群体智力”和“人际网络”的优势。

学习唱歌是灯歌团第二个主要的共同目标。灯歌团有着固定的学习时间,每周五晚上在牟老师提供的场所学习唱歌,具体内容包括学习新歌、复习老歌以及为新的舞台表演进行排练。灯歌团学习的新歌内容丰富,不仅包括大量的本地民歌,还有号子和一些新创作的民歌。本地民歌主要由灯歌团的农民歌手牟老辈子和翠姐负责传授,他们会挑选自己认为好听且有价值的歌曲传授给大家。这些原汁原味的本地民歌是灯歌团学习的主要内容。通过与外围成员交流,灯歌团也获得学习新歌的机会。音乐人士姚本树将经过改编后的民歌传授给成员,比如《说起唱歌我就爱》《山寨门户为你开》等,这些歌曲既保留了原生态的味道,又有新意,符合当下审美,已成为灯歌团的固定表演曲目;团长牟老师偶尔还会邀请一些擅长唱本地民歌的老人来灯歌团教唱。据不完全统计,灯歌团成员先后学习100多首民歌。部分曲目,见表2。

表2 利川灯歌演唱团学习的部分曲目

序号	曲目	序号	曲目	序号	曲目
1	拖船号子	7	哭嫁歌	13	双探妹儿
2	石工号子	8	盼红军	14	单探妹儿
3	娃娃把手招	9	这山没得那山高	15	杨四妹儿
4	撼山号子	10	小小幺姑爱坏人	16	凤凰歌
5	双手搭在妹儿肩	11	黑五更	17	梳妆歌
6	掐韭菜	12	睡五更	18	鸦鹊嘴巴喳

通过灯歌团的努力,来自农耕语境的传统文化正以新的内涵延续文化认同和生活功能。民歌学习不仅满足成员自我成长的内在需求,还加强成员对社群的归属感和成就感。他们认为学习灯歌是文化传承行为,还能够在亲朋聚会的娱乐活动中表演,从普通人成为一个“歌手”。在学习歌曲的过程中,成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歌曲进行演唱,并对歌词和唱法进行集体创编,每个人都贡献智慧,使农耕歌曲融入当下的生活语境。

灯歌团第三个主要的共同目标是舞台表演。对于个人而言,舞台表演能够促进个体的成长。每一次舞台表演都是对学习成果的检验,成员们都具有表演者的心态,即为这一次舞台表演和观众负责。他们会抽出大量时间参加排练,提升表演能力,保证舞台效果。在舞台表演中,灯歌团向观众展示社群实力,传播自身形象,获取社会关注;舞台表演还激发成员的集体荣誉感和对灯歌团的身份认同,加强了社群内聚力。舞台表演是灯歌团参与当地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形式主要包括爱心公益活动、民歌比赛、与歌唱家交流、文旅活动等。部分舞台表演活动,见表3。

表3 利川灯歌演唱团部分舞台表演

活动日期	活动内容
2016年3月18日	走进利川市敬老院演出
2017年7月2日	走进中国黄连科技示范村建南镇大道角村演出
2018年10月1日	参加重庆市云阳县民歌赛
2018年10月—2019年2月	参加利川市扶贫慰问演出
2021年10月14日	参加《国家记忆·中国民歌湖北卷第二卷》录制
2023年1月4日	参加《灵秀湖北·四季村晚》之《龙船水乡》节目录制
2023年11月12日	参加2023武陵山原生民歌大赛
2024年7月—8月	参加利川佛宝山景区情景民歌互动表演
2025年7月16日	参加利川市鱼木寨村“逛鱼木寨,赶大兴场”活动表演

舞台表演使成员对文化传承的意义产生更真切的理解和体悟。2018年底,灯歌团参与43场扶贫慰问演出。该活动由利川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和利川市扶贫办联合举办,灯歌团以本地民歌为主进行内容创作,为利川43个村镇的扶贫干部和村民进行表演。在演出中,地道的本地民歌受到欢迎,为寂寥村庄的公共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在村民们的热情反馈中,成员们感受到传承利川灯歌的意义。2018年10月17日,成员周洋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我们来到利川最偏远的文斗乡碑梁子村,老百姓竖起大拇指说我们节目很好。从城市到农村,来回10个小时奔波,但能得到大家的肯定,为扶贫做贡献,我们就满足了。”通过扶贫慰问演出,灯歌团获得社会影响,不仅被当地媒体报道,还得到利川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肯定和奖励,成员们深刻体悟到文化传承的价值升华——个体兴趣爱好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成员们深化对传承实践意义的认识和体验,创造出社群内部文化,形成文化传承的社群氛围。作为一个学习型社群,灯歌团的共同目标不仅是实践性的,还提升成员对文化传承意义的体悟,两者相互促进。社群的共同目标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引领个体和社群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四、结论与讨论

对于利川灯歌演唱团而言,本地文化认同、个体心理需求和主流话语支持是社群维系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灯歌团是一个松散而亲密的开放式社群,成员因趣结缘,结构松散,但中国式的人情

因素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使成员关系较为亲密。中国式人情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提供了一条关系纽带,加强了成员间的信任和情义。灯歌团是一个学习型社群,搜集学习资源、学习新歌、舞台表演是社群成员的共同目标。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成员对文化传承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并形成文化传承的内部文化和社群氛围。成员在社群发展中获得成长,文化传承在社群实践中获得群体动力,社群为成员和社会带来价值。

利川灯歌演唱团的群体动力场包含不同的“力量”因素。在理论上,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分析趣缘社群的群体动力。一是社群成员的个人心理和认知层次,即认识和体验到自身和社群实践的意义与价值。文化认同、国家主流话语、传统价值观等都为意义建构提供材料,成员赋予自身和社群实践丰富的意义和价值。二是社群内部的结构和互动层次,主要体现在社群平台和人际关系上。趣缘群体的平台吸引力、松散而亲密的社群关系、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以及在社群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归属感都是群体动力的重要来源。三是社群实践及共同目标层次,社群能够为成员提供自我实现的平台,社群实践进入公共文化生活,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共同目标在实践中逐步实现,为成员和灯歌团的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意义建构、社群结构和社群目标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灯歌团的群体动力来源。意义建构是社群实践的心理和认知基础;社群结构决定社群实践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目标的实践过程为意义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在趣缘社群的文化传承实践中,文化认同贯穿整个群体动力场。文化认同具有纽带作用,将个体意义、社群发展和社会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时代,应重视趣缘社群在文化传承中的主体性作用,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其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 2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2] 邢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与文化精神.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89-95.
- [3] 恩贝尔 C, 恩贝尔 M. 文化人类学. 王晴锋, 译. 13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4] 翁旨远. 社群创新介入为乡村非遗活态发展赋予新动能——以金华地区为例//施俊天. 设计创造未来——2021年青年博士(国际)论坛论文集.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 [5] 李宁. 基于社群共创的南通板鹁风筝文化服务设计研究. 无锡: 江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2024-02-23].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B5Z0i9DW_xsSTvoMQfnUt-wl5asO8TwOxeWs_loMTdsnuRYdyJ2gthFD9IxeNXCSyoDetG1Ca86FiV510gE5J2N02PJ088NGG8JR8NINktYeUKvfKifMRnIIPFRgBmLnGvWu2_EoYh4e7yBHKuZW61m5V6pGm_cc8m0CBajA61BurALUv8I9Nh6sLRLgHwbV&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6] 李冬. 湘西州“非遗”传承群体研究. 吉首: 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2024-02-23].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B5Z0i9DW_yDiJKbJPvprtuaKNPFIgw1bb3d7t0Vp6ht0CikBqHH-hrDnPKrq4d-O-8lRxxq-YYn7giTH1MZyZmk26o40HrRGmkMo7TAJoBoml3mSod1-dprUTdo2liiWBMgpyIw3e-PdYsuXm5YJntTobrjbiXN7ujrL0wJ40MY0VIAxs4iqAUTop0b_6JN&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7] 张宗建. 民间美术类“非遗”传承制度与社区群体参与的矛盾及反思——基于菏泽地区民间美术的调查. 重庆: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2024-02-24].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B5Z0i9DW_zIncMQ1wrw5QmbZdvTSSuTUPiCmz-bOx-gAZX0mbNU3de88SxcRrzvwHx0XIEJzR0AUaEE0d_M3370gjXKnWYVUfaDra6JkOctFhXW-E2XKjCl9Dzj3MebOMxC5R7QaQb5-0wkMpDfVmVro6xNnNl6fetZvNT2oY9sr8wvzvnFh1X-KjXMOFLh&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8] 覃金盾. 从乡土走向城市的壮族山歌——城市壮族山歌表演空间与歌唱表述的当下变迁. 艺术探索, 2020(2): 111-116.
- [9] 凌晨, 梁琪. 城市音乐视角下德保壮族山歌的音乐变迁与族群认同.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23(4): 89-99.
- [10] LEWIN K. Experiments in Social Space(1939). Reflections, 1999, 1(1): 7-13.
- [11] 李明. 世界著名心理学家: 勒温.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12] LEWIN K.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1.
- [13] LEWIN K.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ometry*, 1945, 8(2): 126-136.
- [14] LEWIN K. Psychology and the process of group living.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43, 7(1): 113-131.
- [15] 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胡景北,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6] 梅松纳夫. 群体动力学. 殷世才, 孙兆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7] FINE G A. *Tiny publics: a theory of group action and cultur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2.
- [18] 温格, 麦克德马, 施奈德. 知识社群: 将个体知识融汇成集体智慧. 边婧,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 [19] ARGOTE L, LEE S, PARK J.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rocesses and outcomes: major finding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Management Science*, 2021, 67(9): 5399-5429.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国发〔2011〕14号. (2011-05-23) [2024-08-30]. https://www.gov.cn/govweb/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84885.htm.
- [21] 湖北省博物馆. 百年民俗 湖北记忆.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22.
- [22] 格尔茨. 地方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杨德睿,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3] 黄中骏. 论民歌《龙船调》的历史传承、艺术特色和启示. *中国文艺评论*, 2019(10): 32-40.
- [24] 马斯洛. 马斯洛精选集: 动机与人格. 方士华, 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 [25] ZANDER A. *Making groups effective*. 2nd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4.

Group Dynamics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n Interest-based Group

Chang Liying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terest-based groups serve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Through a field study of the Lichuan Lantern Song Group,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interest-based groups and their group dynamics mechanisms.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oup are driven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dividual needs and mainstream discourse. Although the Lantern Song Group has a loosely-knit structure, its members maintain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Chinese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the leader's personal charisma constituting two key cohesive forces within the group. Driven by the group's common goals, the members collect, learn and perform local folk songs of Lichuan, spreading and innovating them through collective composition to promote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hese folk songs. The group dynamics of interest-based groups mainly exist at three interconnected levels: meaning making at the individual cognitive level; group structure shaped by member interactions, group practices and goals that reflect platform valu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group members permeates the field of group dynamics, closely linking individual meaning, group development and social value.

Key words: interest-based group; cultural inheritance; group dynamics; meaning making

■ 收稿日期: 2024-12-01

■ 作者单位: 常立瑛,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黄石 435000

■ 责任编辑: 刘金波